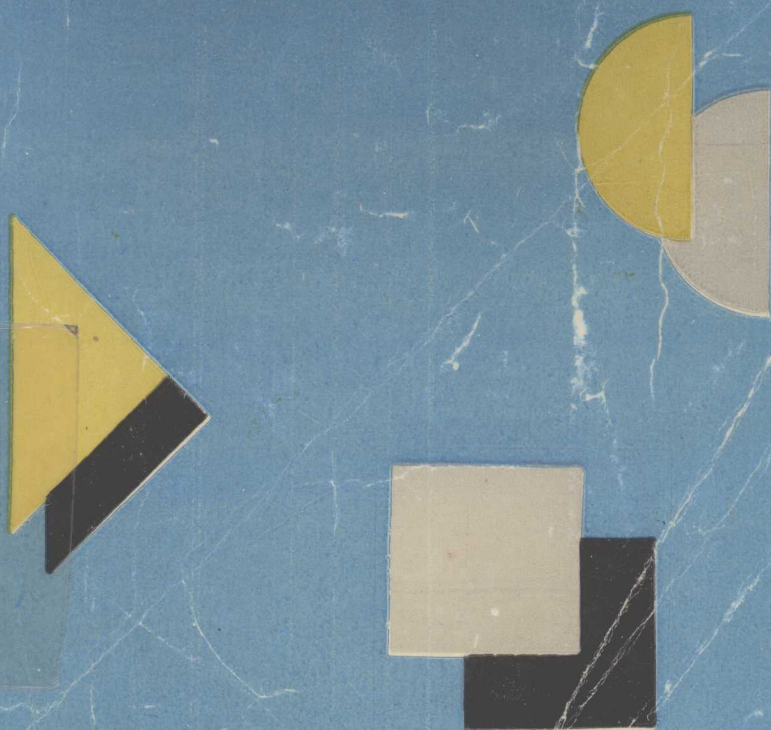


陈振明 著

新马克思主义”

——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



厦门大学出版社

陈振明 著

“新马克思主义”

——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9

“新马克思主义”

——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

陈振明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沙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1.25 印张 2 插页 278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615-0511-6/B·20

定价：5.80 元

前 言

“新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潮，它不仅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密切相关，而且与当代西方其他各种理论思潮以及当代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发生了一定的知识关系。近一二十年来，“新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仍在增长，研究在深入。显然，加强对这一自称以马克思主义定向，并且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潮的研究，无疑具有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入评析当代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进一步了解当代社会科学的进展、成就及遇到的难题。这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正如副标题所示，本书是对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而不是全面介绍“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理论的著作。作者的这一选题并非单纯出自篇幅和精力所限等方面的外在考虑，而主要是出自于内在方面的原因，它是由卢卡奇、科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一致性和典型性等因素所决定的。首先，这几位代表人物或流派在整个“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卢卡奇、科尔施是这一思潮的奠基人，法兰克福学派是这一思潮的最主要、最有影响的

流派；其次，卢卡奇、科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及师承关系，他们同属于“新马克思主义”中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再次，他们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典型性。德国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卢卡奇、科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德国的文化传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更正宗的味道，可以当作“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典型来加以解剖。实际上，他们这几个代表人物或流派的观点成了后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参照系。因此，将“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或流派的理论相对独立出来，进行重点分析研究是合理而必要的。

本书设四章，外加一个附录。第一章可以看作一个导论，着重讨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描绘整个“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总体图画；第二、三、四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分别讨论卢卡奇、科尔施、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观点。在讨论这几位“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或流派的理论时，作者不仅注意其中的那些基本的、已为人们所研究过的方面，力图对这些方面作出更全面、深入的剖析，而且更把重点放在他们理论中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或重视的方面。例如从科技哲学的角度，评述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形式理性）、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以及由此基础上形成的辩证理性观或批判理性观，“批判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理论，讨论了他们的“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又如，作者也相当注重卢卡奇、科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立场和观点上的变化。作者强调卢卡奇在20年代中期以后向马克思主义的靠拢，着力讨论他中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评述科尔施20年代中期以后的反对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也适当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后期的批判理论的演变以及它

们某些代表人物是如何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向资产阶级的辩护士的立场的。)✓

“新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作者近年来的教学、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1990年开始，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社会主义研究》、《学术月刊》、《教学与研究》、《现代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本书可以说是在这些研究心得的基础上形成的，书中的第四章则利用了作者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材料及观点。作者在研习“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得到理论界的不少知名学者及师友的关怀、指导和帮助，尤其是得到了龚育之、许征帆、黄顺基、陈先达、陈昌曙、夏甄陶、丘亮辉、钟宇人、奚广庆、沈冲、刘炯忠、刘大椿、李庆臻、周养性、周济、张澄清等各位教授的点拨；本书也参阅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著，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诚望读者指正！

作者

1992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1)
一、	“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演变 ……	(2)
二、	“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25)
三、	为什么要研究“新马克思主义” ……	(36)
第二章	卢卡奇与“新马克思主义” ……	(49)
一、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	(50)
二、	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 ……	(64)
三、	卢卡奇的自然观 ……	(74)
四、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87)
五、	卢卡奇的“批判的科学哲学”理论……	(100)
六、	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115)
七、	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概念……	(128)
八、	卢卡奇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及其辩证理性观……	(141)
九、	晚年卢卡奇的哲学思想……	(162)
第三章	科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180)
一、	科尔施的生平、著作及思想演变……	(181)
二、	科尔施的“实践社会主义”理论……	(193)
三、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	(205)
四、	科尔施对列宁哲学的批判及其后期的 “马克思主义观” ……	(219)
第四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232)

一、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沿革·····	(233)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观·····	(252)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观·····	(267)
四、社会批判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	(285)
附录：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实证主义和科学	
技术的批判 ·····	(294)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294)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309)
三、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322)
参考文献 ·····	(345)

第一章 “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在人类思想史尤其在哲学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种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想或学派,往往被“复活”或“重新发现”,从而形成与这种原来的理论有联系但又有很大差别的“新”流派或变种。例如,19世纪70年代在“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下,出现了“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19世纪60年代在复兴黑格尔主义的思想趋势中,则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ism)。当代“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种“重新发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或学说。它主张回到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重新解释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马列主义所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又有别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理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社会思潮,“新马克思主义”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定性,即有它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特征,它也有着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勾画出“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轮廓,着重讨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演变、理论特征以及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等问题,为更好理解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基础。

一、“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演变

迄今为止，“新马克思主义”已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它最初是20年代初期由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或批评而兴起，继而在20年代中期以后，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的展开，逐步成长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出现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些很有影响的基本流派。60年代末的“新左派”运动及学生造反运动则使“新马克思主义”声名大振，进一步扩散，但另一方面，它也开始面临着衰弱和解体的命运。因此，整个“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分为诞生（20年代初期）、成长（1924—1968年）、鼎盛及趋向解体（1968年以后）三个阶段。

1. “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它的诞生以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出版作为标志。它的孕育期则要前推好几年，从1918年前后开始算起。

“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的。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引起了欧洲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新纪元，此后几年，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先后爆发了革命起义，但到1922年，起义都相继失败了。在20年代

初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处境艰难，正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也着手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积聚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内部开始了一场自发的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着力于研究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并对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策略、理论和实践提出疑问或非议，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既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等人所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不同于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观点的解释，这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态。它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及葛兰西所参与编辑的《新秩序》和他后来的《狱中札记》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因此，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被人们看作“新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相应被看作“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中心论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极端重要性，主张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的革新和扩展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围绕这一中心，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础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来更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总体性范畴放在辩证法的中心地位，又将总体性解释为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并考察了实践概念。由此出发，他断定，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辩证法就是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则只是一种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并批判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他力图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考察了物化、阶级意识等问题，强调无产阶级意识（主观性）的巨大创造作用。由此可见，《历史和阶级意识》所涉及的不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枝节问题，而是它的基础和根本性的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自然观、实践观、认识论、历史观等，卢卡奇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的回答。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中心是标题所示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宣称该书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分析历史时所采用的辩证观点来分析整个“上层建筑”问题，以便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原则性和明确性。科尔施反对脱离实践的理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脱离理论的实践——修正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主张通过黑格尔哲学来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给马克思主义重新确定方向。他也强调总体性的观点，特别强调意识或主观性的创造作用，反对唯物主义反映论。可见，科尔施的思想倾向与卢卡奇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一点，科尔施自己也是明确承认的。

葛兰西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尽管他被人们与卢卡奇、科尔施并列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但他的观点与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观点有着较大的差别。他被看作“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的主要原因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也作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哲学既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他将实践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的统一体，葛兰西不主张使用“唯物辩证法”概念，而主张用“合理的辩证法”概念来取代。他也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宿命论观点，强调意识的能动创造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强调意识形态方面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大意义，他还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首要性和次要性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无关紧要。

由此可见，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

解释，开创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传统，确定了“新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和设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因此，不管他们自己的主观意向如何，他们客观上的确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以后的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基本上是沿着他们开辟的方向前进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三位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立场和观点与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有较大差别，他们三人当时分别是匈牙利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是当时革命斗争的直接参加者和组织者。卢卡奇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红军师政委，在20年代流亡奥地利时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一名领导成员。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和阶级意识》被批判后，卢卡奇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力求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因此，他中后期的理论立场和倾向已有所变化，他的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增加了。科尔施于1923年以共产党人身份担任过图林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并当过议员，并成为议会左翼领袖之一。但是，他与卢卡奇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被批判之后，他并不象卢卡奇那样作自我批评，而是坚持和发展这本书中的理论立场和观点，最后被开除出德共。因此，从20年代末开始，科尔施便以“自由批判理论家”的面目出现，走上了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葛兰西的政治地位比卢卡奇和科尔施更为突出。在1919—1920年，他是都灵工厂理事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理论家、《新秩序》杂志的编辑，他是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最早党员，并在1924年成为党内最有影响的领导人，1926年被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度过了9年的监狱生活，于1937年因病在狱中去世。从总体上看，葛兰西是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由此可见，开创了“新马克思主义”模式的这三位创始人在20年代前后，基本上并未使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他们在这个时期是结合革命实践经验和需要来讨论

理论问题的，而且他们的主观愿望似乎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区别于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及代表人物的重要之点，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逐步将理论与革命实践脱离，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大学讲坛或研究所里的研究对象。

2. “新马克思主义”的成长

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60年代末这4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看作“新马克思主义”的成长或演变阶段。这一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传播和扩散，并与各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尤其是流行的哲学思潮相结合，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基本流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这一时期“新马克思主义”演化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29年的国际性经济危机宣告了20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结束，世界在动荡、分化。法西斯主义势力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兴起，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仅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取消了资产阶级一切形式的民主，野蛮、屠杀、恐怖笼罩着整个世界，人民陷入灾难之中。二战以法西斯主义的失败而告终。随后，出现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欧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战后的20年西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与两次大战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西欧国家并没有倒退到公开的军事或警察专政，在整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世界里，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首次变得“稳定”和“正常”，资本主义世界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期的“繁荣”。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二战后西方的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进步尤其是科学革命造成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

“科学与技术日益相互依赖而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历史趋势，科技进步给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生活水平；科技革命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使股份公司这一资本所有制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个基本形式，使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加快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步伐；科技进步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出现了某些新情况和新特点（如“中间阶层”队伍迅速扩大和作用的日益突出等）；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日益变成统治的工具，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异化现象，使人倍感压抑和沮丧，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还产生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一切既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基础，也向“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同时，二战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斗争而威信大增，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及亚洲许多国家的建立（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它冲破了资产阶级的禁区，进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和大学课堂，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逐步形成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热潮。此外，30年代初期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的正式发表，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回到“青年马克思去”提供了研究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首先，在德国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德国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哲学的故乡，也是“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科尔施本人是德国人自不待说，卢卡奇虽是匈牙利人，但他更多地是在德国（海德堡）成长起来的。因此，他思想中德国

文化因素是多于匈牙利文化因素的，他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紧密结合德国哲学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是紧接着青年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形成的，它直接继承了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德国的文化气氛中成长和壮大，因此，它具有其他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和正宗的味道。

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特定的左翼激进的社会—哲学流派，是本世纪20—30年代围绕M·霍克海默所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及其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立于1923—1924年间，最初由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C·格伦堡任所长。在格伦堡的领导下，该所逐步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交汇点，成为一个在学院的框框中研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心。但在整个20年代，它并未形成“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因此，在这一时期，该所主要致力于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把扎扎实实、富于经验的工作与严肃的理论分析相结合。作为所长的格伦堡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问题放在首要位置。1930年，霍克海默担任了研究所所长。他一上任，就改变了研究所的工作方向和出版主题，研究所开始转向社会—哲学方面，从事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综合性研究，尤其加强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研究。1932年研究所停止出版《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用《社会研究》杂志取而代之。在1933年前后，霍克海默在研究所周围聚集了一批各色各样的、多才多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有T·W·阿多尔诺、H·马尔库塞、E·弗洛姆等，这些人一直活跃在30—60年代的理论舞台上，而60年代末开始则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包括J·哈贝马斯、A·施密特、K·奥菲等。

从一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便以“新马克思主义

义”定向，这种方向是霍克海默奠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并将社会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批判地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或“重建”马克思主义，形成较为系统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许多方面直接继承和发挥了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用黑格尔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否定自然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说明总体性及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反对反映论等。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有不少自己的理论特色。例如，他们加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社会的思想文化或意识形态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心理的批判性研究，日益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批判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又在此基础上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的过时，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加以“补充”。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开了后起的“新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割裂的先河。

顺便指出，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地理上毗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往往也被人们当作“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是指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一种倾向，始於1907年有份量的《马克思研究》著作发表时。它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维也纳的一个学派，它不是一个政治或工人的组织，而是一种思想倾向。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卡尔·伦纳和鲁道夫·希法亭。这些人的最初想法是急于解决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和民族问题等各个领域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其主要特征在于